Co-China 周刊

NO. 161
2013年7月5日

贾选凝：香港的“在地”价值为何珍贵？｜周回：「土地不屬於人，人屬於土地」——卓佳佳專訪｜卡爾·波蘭尼：《大轉型》，<自發調節的市場與虛擬商品：勞動力、土地與貨幣>



编者的话

电影《窃听风云 3》中，住在新界乡下的周迅回头望了望门前那块地，对吴彦祖说：“地是用来种的，不是卖来卖去的。”对新界东北抗争中的原居民而言，这大概是最打动他们的一句话。

自 2008 年香港新界东北发展方案立项以来，反对的声音就未停止。直到 2014 年 6 月 13 号，立法会审议新界东北前期拨款时，逾千名示威者在立法会聚集，将反对的浪潮又一次推至高潮。香港常常被认为地少人多，但新界却似一个大农村，未开发建房的土地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土地对香港有怎样的意义？本期 Co-China 周刊从香港新界东北土地议题出发，梳理对抗卖地发展逻辑的，是怎样一套伦理？思考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贾选凝分析了新界村民和其他反对团体不同层面的反抗原因，从环境因素到中港矛盾。原因背后有颇深的价值观烙印，即所谓“在地”。她认为，“在地”价值在香港逐年凝聚且难能可贵，年轻一代 80 后更能从本土出发表达对香港的热爱与对现实的不满。而陈剑青在一次对香港本土社运参与者朱凯迪的采访中，观察到他们在本土运动中，更加认识到土地与人天然的紧密连接，更关心现代化城市中的土地与社区价值。第一部分的最后，这篇香港土地制度的背景资料，有助于理解香港特有的“丁屋政策”，理解新界土地买卖争议背后的症结。

正如几个世纪前，印第安索瓜米西族酋长不解现代人怎么可以买卖土地一样，新界马宝宝社区农场创始人卓佳佳也认为，“土地不属于人，人才属于土地”。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 在著作《沙乡年鉴》中，总结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他将人类的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范围，人类只是大地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统治者。

毋庸置疑，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人与土地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今天，我们不仅不属于土地，甚至以土地为生意，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看来，土地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其并非人类的创造。土地与劳动力和货币一起，投入市场运作，将会产生邪恶的影响，而社会将就此做出反向运动保护自己。可以说，以土地为名呼吁土地正义的运动，正是这种反向运动的一种。台湾呼吁土地正义的历史久过香港。《私有财产制下的土地正义》以台湾苗栗县大埔征收案为例，带出了台湾私有财产制下何为土地正义的问题。而在长期关注台湾土地问题的徐世荣教授看来，只有让民众及权力弱势的一方



能够充分参与规划的过程，并共同来型塑他们生活的空间及公共利益，才能真正落实土地正义的意涵。



目录

【例】

梁海明：香港人你看不懂



梁海明，香港财经评论员、盘古智库研究员。

“

这种买卖土地形式，在香港有个很形象的比喻：开发商是“蛇头”，乡绅当“猫狗”，“猫狗”劝原居民卖地给中介公司，土地最终落入“蛇头”手上。因此，开发商囤积的新界东北土地，实际上是向新界原居民购买所得，一个愿卖一个愿买，这恐怕应该说是“绅商勾结”，而非“官商勾结”。

”

内地众多地方政府年年都在起劲甩卖土地的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却总是因为寸土难寻而焦头烂额。

说房子在香港是必需品，不如说是“急需品”，就算不去管每年几万对结婚新人要买房的需求，光是特区政府公屋（类似廉租房）轮候册上，就有超过 25 万低收入人士在排队等候。

是香港缺乏土地吗？非也！香港至今只开发了不到 30%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港岛、九龙，还有超过 70%的土地尚未开发，它们主要集中在新界，从卫星图片上看，新界还完全像是一个还没开发的农村。

新界东北地区的广袤沃土，只要开发 500 公顷就可解决数十万人居住、就业问题。特区政府筹划开发新界东北也已超过 16 年，但近日依然遭受大批市民抗议而寸步难行。

这让不少人看不懂，土地、房屋供应均奇缺的港人，为什么自己与自己作对，反对开发新界东北地区，建设新市镇呢？

【港人反对开发土地】

港人的“反常”，一般被归结为三个原因。

首先是环保因素。环保与发展的矛盾早已成为全球性难题，香港的环保势力同样强大，以至于特区政府要填海造地，要问白海豚反不反对；特区政府征收农田，要问庄稼同不同意。自认为能与白海豚、庄稼“直接沟通”的环保组织，以开发新界破坏耕地资源为由，一直极力反对特区政府的发展计划。

原因之二是微妙的反“自由行”情结。新界东北开发计划不但涉及建房用地、商业研发和发展用地，同时还涉及建设内地“自由行”边境购物城用地，以及大陆香港经济合作区。有些反对者担忧这将容易导致新界东北地区，最终成为内地民众不用签证就可以进入的“特区之特区”，带来更大内地游客压力。

原因之三是对于开发计划涉及官商勾结的怀疑。特区政府的发展新界东北地区计划筹划已久，不少开发商过去多年不断买入、囤积新界农民手中的土地。同时，新界东北未来的建设中，也不可排除地有多家开发商加入，部分港人因此批评政府“利益输送”、“官商勾结”。

【三原因背后的隐情】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以上三个因素的细节，可以轻易发现反对背后的隐情。

其一，新界地区并非全是耕地，多达数千公顷土地甚至长年荒废，杂草丛生。而且根据统计，香港市场上的农产品来自新界东北地区的也只有 3%左右。香港作为全球进出口贸易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 3%的农产品显然不是无法取代的。

其二，虽然多个反对团体高举“保卫新界东北”的旗帜，但大多数反对团体并非新界原居民，例如由当年反高铁人士“旧酒装新瓶”成立的“青年重夺未来”团体，与香港不少激进反对党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谓“一朝学得胡儿语，登上城头骂汉人”，这些并非新界原居民的反对者家住新市镇，却反对兴建新市镇，犹如此前他们坐着地铁去立法会前反修建高铁，站在会展中心反对填海，这种自我矛盾的行为，背后原因不难推断。

其三，特区政府真的勾结开发商吗？并非如此。早在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时，虽然英国国王拥有香港主权，但却受制于割让条约中一条款：“保障原居民利益”，新界的土地依然由原住民拥有。对此，英国陆续推出了所谓的“土地使用条例”（Land Utilization），规定虽然新界原居民拥有土地，但土地只能用来做农田，不能有其他用途，要修改用途，例如建屋，需要港英政府批准，以此限制原居民的利益。



1972 年港英政府更出台了“新界小型屋宇政策”，也就是俗称的“丁屋政策”，规定每名男性新界原居民，年满 18 岁均可向政府申请土地，兴建一栋不高于 3 层，每层不超过 700 平方英尺（约 65 平方米）的住宅，无需补地价。这一政策让原居民不害怕失去土地，港英政府因此顺利地在新界多个地区征得了土地完成新区开发。

这个政策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被延续下来。在这个“丁屋政策”下，不少“男丁”众多的原居民家庭，以及不准备自己兴建“丁屋”的原居民，在新界各村落的村长、乡绅们牵头之下，与开发商合作，收集原居民的“丁权”后可建成豪宅出售。这对原居民而言，可获得卖地的收入，村长、乡绅们可得丰厚中介费，对发展商而言，则获得了较低价的土地。

这种买卖土地形式，在香港有个很形象的比喻：开发商是“蛇头”，乡绅当“猫狗”，“猫狗”劝原居民卖地给中介公司，土地最终落入“蛇头”手上。因此，开发商囤积的新界东北土地，实际上是向新界原居民购买所得，一个愿卖一个愿买，这恐怕应该说是“绅商勾结”，而非“官商勾结”。

此外，一些财力丰厚的原居民，趁机囤积土地后，在土地上种植庄稼或修建简易房屋，趁特区政府征地时坐地起价，要求政府以市区地价购买新界土地。这些原居民甚至声称，只要特区政府出得起钱，“古庙可以拆卸重建，祠堂都可送给政府”。

【发展计划乱象重重】

不少人可能都留意到，新界东北开发争议，仅仅是香港社会纷争不断的一个小缩影，近年来，类似的纷争和反抗层出不穷，大到兴建与内地连结的高铁、大屿山机场修建第三条跑道，小到重建老旧的玛丽医院，几乎都难以按计划实施，几乎都有为数不少的民众反对。

对于香港的基建和开发项目总是出现这种乱象，不少内地媒体的报道、评论以“香港不再香”、“香港被边缘化”，乃至以“香港经济将死”等为题，认为在外部势力的介入下，加上香港自身纷争不断，香港的前景已越发模糊混乱，发展失去方向感。

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报道、评论说对了一部分，香港当前的乱象，确有外部势力介入的迹象。但在这里不能不说的是，这些论断往往没有意识到香港社会各种纷争背后的根源，其实反映了许多香港人心态的转变。

虽然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避免衰退，成为 20 世纪衡量进步的普世价值，被包括香港政府之内的多个政府当作绩效标杆，但是越来越多人也发现到，经济快速发展，未必能带来普遍的富足。

英国一个研究机构在大量分析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数据后指出，当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增加到 1.5 万美元以上之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均寿命增长、教育参与率以及各种“富足感”指标就不显著增长。

例如在美国，自 1950 年以来实际平均国民所得增长了 3 倍，但自认为“非常快乐的人”，其比例几乎毫无增长，1970 年代中期开始还反而减少了。再从一个反例来看，日本虽然经济已经“迷失廿年”，期间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环球金融风暴冲击，但日本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几十年来也没有什么下滑的情况，而且，现今日本民众平均寿命的上升速度，却比前 20 年任何时间来得快。

经济增长未能增加“富足感”的同时，经济扩张还不停地制造新的“麻烦”，当今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经济扩张引发全球环境问题更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

更严重的是，在 2008 年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环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后，虽然许多国家政府推出刺激经济政策，伴随经济数据好转的，是股票飙涨、房价高不可攀，香港资本市场也同样水涨船高。但是，众多调查也都显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只是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造成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更多的民众的生活愈加困苦，经济增长的假象只富足了富人。

所以，在贫富差距特别显著的香港，不少人对特区政府提出的发展计划并不卖账，认为这里就业率极高，福利保障也相对完善，即使经济增速不高，民众依然可以安居乐业，各种让经济“快速发展”的措施，既难让自己得益，反而扰乱了许多宁静的生活。

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奥弗尔（Avner Offer）指出，“真正的富足，是短期激情和长期保障之间的适度平衡”。在不少港人认为特区政府目前的经济发展逻辑是错误的情况下，往往习惯性地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任何发展计划。

这些港人更深层次的想法则是，希望香港的未来发展能够更加节约与平衡。不少港人认为，虽然香港仍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尚未开发，但政府并非全无办法，而是可以选择在现有的土地储备和旧区改造中优化资源的利用，把有限的资源留给下一代。只有节约资源，才能在未来应对更多的难题乃至危机。

这样的认知，似乎更接近节约（Frugality）这个单词的来源。与许多人的猜测不同，这个词的起源完全与艰辛等意思无关，而是拉丁文中的“果实”。英语和拉丁语系的“节约”（Frugal）一字，从拉丁文的“Frugi”衍生而来，由“Frux”（结成果实）间接受格形成



无语尾变化的形容词，而且常常和“Bonae”（好处）合并使用，构成“达到或为了“好结果”的含义，意指节制可以令社会达至长期的繁茂兴盛。

一位曾在港工作多年的内地高官曾说，香港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读。我还想说，香港这本书虽然看似以汉字书写，但其实暗藏晦涩的符号语言（Symbolic Language）。一些内地朋友今天从书中“读”到的纷乱、内耗、原地不前，但对香港民众而言，却可能是归属感、责任感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随着内地和香港经济差距越来越小，民众的追求愈来愈趋同，今天的香港，明天，你或许就能读懂了。

（本文来自腾讯大家频道）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朱凯迪：东北 613 行动的前因后果

朱凯迪，香港社会运动人士，菜园村关注组成员

> **“公众可以知道，当计划彻底破坏原有社区和环境时，政府原来没有区内长者数目的资料，所以根本不打算照顾他们的特殊需要，没有想好令失去农地的农友得以复耕的方案，连村民的“公屋原区安置”也是假的，因为当第一期公屋落成之日，村民早已全部被逼迁四散。”**

立法会财委会新界东北前期拨款审议，跟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的反高铁拨款抗争，何等相像。倡议者都是透过经年的持续斗争，把一个本来在主流意识中已有定见的事情，重新问题化；公众都是透过传媒看到大规模冲击，首先把结论锁定在“香港愈来愈乱和失控”，之后才慢慢松动。然而，公众意识改变之慢，与政治机器与推土机之快，对比鲜明——过了四年，香港市民才擦亮眼睛看清高铁之“大镬”，但也无人敢轻言停工止蚀。星期五的冲击立法会行动导致财委会被迫休会，也只是令更庞大的新界东北利益分赃集团，稍微撼动了一下。

“撼动了一下”换来的，是警察报复式地殴打和恐吓被捕示威者、各级高官和保皇党议员的暴力谴责、还有发展局在 Facebook 制作新的反驳文宣。可以说是两年来，四处奔走的新界东北村民招来最热闹的“招呼”。二零一二年起，东北三区村民和支援者组成联盟投入抗争，保卫家园和乡郊环境，可是，除了二零一二年九月在上水举行的数千人“谘询会”和发展局长陈茂波在古洞北囤地自肥得到较大关注外，反对运动一直波澜不兴。

政府急忙申请三亿前期工程拨款

村民之后像被牵着鼻子一样捱过明知是假谘询的法定程序：去年年中动员市民反对东北的环评报告；年底在全港摆街站，为反对城市规划委员会通过东北的规划图，收集了四万多个反对意见。到今年五月，城规会尚未通过东北规划图，政府就急忙到立法会申请三亿元的前期工程拨款，包括详细设计和土地勘测。村民组织很清楚，如果前期拨款通过，东北计划将成既定事实，因此在五月二日财委会开会审议拨款之前，一早已经部署这场议会内外的抗争。

五月二日、五月十六日、五月三十日、六月六日、六月十三日，新界东北前期拨款审议，连星期五在内，已经经历了五次会议。村民组织的希望是，当议员尽力在议会内审议，向政府质询，来声援的市民会愈来愈多，从而对政府产生压力。村民组织和支援团体下了很大苦功，事前联同支持村民的议员办公室，一起研究新界东北计划的问题，并撰写上千条的动议。可是，头四次审议只有很少普通市民到场声援，来的都是村民和核心的支持者。村民组织每次都要租旅游巴，从新界东北千里迢迢把老村民送到金钟，经费用尽了，村民也累了，组织不止一次濒临放弃边缘。

相信前企业高层维护公众利益？

议员和村民互相支撑的那几次财委会，不应称为“拉布”，因为保皇党提倡的所谓“有效率的审议”，实际上就是不去挑战议会的不平等结构、官员和议员跟议案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不去深究议案本身的细节。这几次财委会的审议里，公众可以知道，虽然政府不断吹嘘新界东北是解决未来住屋问题的关键，可是公营房屋占地仅三十六公顷，即整个发展区范围的 6%；公众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立法会内公然说谎，否认曾经进行东北区内的业权调查，反而更加清楚，政府设定持有四千平方米以上的地主可以就地发展的政策，是谘询地产业界的委员会后得出的结果，证实了透过发展向地产商输送利益的指控；公众可以知道，当计划彻底破坏原有社区和环境时，政府原来没有区内长者数目的资料，所以根本不打算照顾他们的特殊需要，没有想好令失去农地的农友得以复耕的方案，连村民的“公屋原区安置”也是假的，因为当第一期公屋落成之日，村民早已全部被逼迁四散。

另外，面对香港这个半民主半威权的政体，每次在立法会的认真审议都必然上升至对议会不民主体制及制度暴力的醒悟。比起四年前反高铁，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状况如今更加不堪。四年前负责推销方案的运输及房屋局长郑汝桦，政务官出身，公众甚至反对者基本上相信她不会涉及贪腐或为了延后利益而卖力推动高铁。

四年后梁振英政府的发展局，非政务官出身的局长陈茂波不断被揭发与所推动政策有利益冲突， 缩至今，今年年初政府找来马绍祥当副局长取代波叔到立法会应战，但此君上任前是全球最大工程顾问公司 AECOM 的亚太区副主席，任内和在东北囤积农地的地产商有多项生意来往，而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在一月至今短短几个月，已经批出价值接近三千万的顾问合约予 AECOM。尽管其利益申报表几乎“一片空白”，但在爆出许仕仁贪污案后，市民是否真的能靠这些身陷利益集团几十年的前企业高层维护公众利益？



至于立法会财委会，主席一职由民主党的刘慧卿换成身陷三重利益冲突（中银高层、港铁董事和新鸿基旗下公司数码通董事）的银行界功能组别议员吴亮星，其主持会议方式的横霸已广为报道，在此不赘。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

那六月十三日的冲击立法会行动是什么一回事？第一，那是迫不得已的行动。正如东北村民组织和支援者在前一日发表的声明〈立会不是堡垒 撤回东北计划〉：“真正出现危机的不是‘立法会的保安’，而是立法会本身。由保皇党透过不平等选举制度控制的立法会，对北京和财阀马首是瞻，罔顾市民利益，一幕幕荒腔走板的闹剧已经气得市民忍无可忍……梁振英和保皇党议员对‘占领立法会’诚惶诚恐，是因为深知自己正在僭夺市民的政治权力，道理不在他们一边——面对着这样一个烂议会，全世界敢于挑战专制的人民，不单止有权在大堂内示威，更有权进入议场，阻止不公义的僭政继续运作。

“新东北计划前期拨款的审议，已经将立法会带到被市民‘名副其实地占领’前的临界点。特区政府要避免市民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中受伤，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顺应民意和大多数直选议员的立场，马上撤回新界东北计划。”行动的原因很清楚，因为吴亮星在星期五晚决定阻止议员提问及提出临时动议，让保皇党实行“少数压制大多数”的议会暴力，如果要阻止议会暴力，村民和市民除了行动起来，没有其他方法。

第二，电视画面很激烈，但行动不是为了捣乱、不是为了发泄怒气，不是为了袭击任何人。行动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进入议会，阻止会议继续进行。

行动带来了打压，也创造了新的形势。市民最容易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激烈的电视画面，我们的责任是让市民看到与激烈的行动对立的制度暴力，看到香港的社会矛盾如何被既得利益集团推向临界点。新界东北计划的问题，归根结柢是一个权力的问题。“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特区政府从殖民政府承继了对于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于是它才可以背逆全世界民主城市的惯常做法，动辄将数以百计公顷有上万人居住几十年的区域圈出，然后联合所有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囤积农地的地产商和新界原居民地主，将原有社区消灭，再规划成空间被高度垄断的市镇。

把握住这一点，市民就可以看懂，新界东北和香港民主发展的紧密关系，也明白为何立法会现在会成为主要战场。简单来说，新界东北这种庞大开发计划可以长驱直进，关键的条件就是不民主的政制。

当财委会因为行动暂停后，几百名示威者重新聚集在立法会门前集会，后来任由警察包围、抬走、拘捕。那个情景令我十分感动，也想起过去一年多来，“占领中环运动”宣传的公



民抗命意识。这几百位示威者，出于对香港的关切，无私地行动起来，而且敢于面对行动的后果，包括被警察无理殴打，在此艰难的时势推动香港民主运动，需要的不就是这种义无反顾的行动力和勇气吗？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陈剑青：土地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访问八乡北候选人朱凯迪



陈剑青，本土研究社成员

> “
> **反而地的意义在乡郊更加能展现出来。凝望一块田会见到不同层次的脉络，哪年打风淹没农产、哪年种过什么，土地之忆记刻骨铭心。所以在乡郊我们能借着人与土地的经验，表达到新的“相对于主流城市想像”人与土地的关系，菜园村就是一个例子。**
> ”

第一部份：运动理念

参选——介入保守性的基进化运动

对于自五区公投后那些政治闷局的日子，能够在访问里返回社会运动本身的讨论的确是阳光普照。访问当刻，我们就谈到参选区议会这个议会与社会运动的汇合点。当社会运动与区议会同步进行，究竟会令运动朝着什么方向进发？八十年代的汇点？九十年代的民进党？抑或其他模样？

对迪来说，这些政治形式都并非相关的参照，参选倒是将一些基进的想法扩展到更多生活范畴、更多社群的一个互动过程。“我不认为，从以前发动社会运动到现在参选，就是象征着一个保守化的过程。”“就以处理渠务的问题为例。如果只是以一个社运组织者的角色，从农民角度出发，渠 （现今的河道整治） 只会被负面地理解为一种配合地产利益而出现的东西。但要是参选，就得顾及那些关注水浸影响的人，如附近的居民、搞货柜场的人。过程中就要学习去探索一种方法，是既要农业，而又处理到不同单位的问题。”处理渠的问题并非意味着要寻求所谓“妥协”的保守化，而是敢于介入保守性的基进化。

“又例如交通规划，现时区内主要的公共交通：专营小巴、红色小巴和巴士，其实是来自三个集团，我们又应怎样理解他们的关系，自己又怎样去定位，从而去改善到区内的交通规划呢？我们能否提出一套左翼对地区交通规划的想法呢？参选就令我开拓了一些新思考，而以往参与社会运动时就未有触碰这么多范畴的问题。”反过来说，对他来说没有站在某

些位置的运动是不能企及的。在区选过程中简化沟通(Engaging simplicity) 所面对位置的复杂思考及实践，那些辛苦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这种身处其中的基进政治必须具明确的主体性。迪认为，形式上区议会或选举代议政制有其本身的规范和包袱。他理解自己参选的意义，就是要带着一套理念去进入选举，透过一个过程去凝聚一些与土盟想法近似的人，而不是要去做“透明人”，一个纯粹代表那几千个选民然后去发声的无意识“平台”。

于是，我们在迪的身上看到基进化的两种意义：一种从渠、交通等基本问题开始去构想改变，与及另一种“置身其中”的基进思考，参选行动与以往众多的运动似乎并无轩轾：阿迪只是一如既往，将自己置于坏透的政治烂泥堆中思索运动空间。

运动的基进化与保守化分别甚远，原来却只差一线。

土地的石头

虽说参选与既往运动想像一致，阿迪亦能对处理问题的类型道出微妙差异。迪以天星、皇后和菜园村的经验去解释在城市和乡郊对土地理解的分别。“其实在城市中，我会重视人在一个空间当中的活动，如一个码头、一个街市，但城市人对土地其实没有太大的概念。公共空间可以让人有不同类型的组织的可能性，如果到处都变成商场，越来越多空间失去公共性，公民意识的培养就会越来越残缺。”虽说城市土地问题包括了卖地、土地运用等整体分配问题，相比起“空间”、“公共”，似乎“土地”在都市环境里不是市民心中的关键词。

“反而地的意义在乡郊更加能展现出来。凝望一块田会见到不同层次的脉络，哪年打风淹没农产、哪年种过什么，土地之忆记刻骨铭心。所以在乡郊我们能藉着人与土地的经验，表达到新的 （相对于主流城市想像）人与土地的关系，菜园村就是一个例子。”

而迪忆述起早前阿竹在口述访问，他惊讶一个农夫对土地的记忆竟可以这么细致，一块田的作物更替，农夫天天都在田上耕耘，满载着与这块田一起成长的回忆。（注（一））在土地上，农地、农夫、村民和村民之间，结合出一种复杂且紧密的关系。在他口中的土地坚如盘石，以上的所有东西，搬也搬不走。

这种土地关系与感觉的认知或者能称之为恢复，“驱使着我努力投身去保育农地，正是因为农地 （土地） 议题或意识能给予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发展一种有别于现时组织的可能。”



迪从“空间转向”到“土地转向”，投入经营八乡的土地，近日连老一辈的原居民竞选对手也说其参选“有勇气”，并“认同理念”（注二），不知是否就是那份坚持勾起了上辈原居民人对土地的一些感应？

由社运到落户八乡

社运中人有不同的人种选择不同的路。有人会选择继续在不同议题游走，或进行据点的“占领”，迪反而认为自己，去到这个人生阶段，可以尝试去“落户”，投入时间去经营一个地方。

“那时在天星皇后曾被人嘲笑的是，因为那个码头是没有居民，无需要做组织，无人抽你后腿，在一个无人居住的空间讲什么意识形态、讲文化当然容易。 但难度总也不比上在一条街、一幢楼去做居民组织。”“后来因缘济遇下在零九年我与菜园村相遇，就决定要帮他们做组织工作，虽然后来我在菜园村逐渐变成一个 秘书、一个像官僚的角色。到现在参选，其实是藉着在菜园村做组织的经验，进身到一个较大的平台去实践，去面对一个难度更高的组织上的挑战。”

我们过往见过，有不少本来很有政治理念的政治人物，参选区议员，在“落户”（其实只是“落区”）一个地区后，彷佛在十多年间就被一个地区湮没了，未能把自己本来的理念带进一个地区中发挥作用，而只是逐渐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区议员。“当然我也担心过参选会是一个恶梦的开始。但如果我没试过又怎知道自己会否变成这样？”

许多人或会认为，这种落户行为对于当今多元化的政治旅途会是一种自杀，无论时间、精力、勇气及“回报”都比走其他的道路艰钜。有关路途，迪明显并 没有沿用这种理性资源逻辑计算，他却以“村”(保卫菜园村）与“乡”(八乡区选）这两种层次具像地说明这条落户的路：“其实护村和区选是完全不同的过程。护村过程是一个杀敌的旅程，而当中自己的团队也见越来越少人留下，菜园村由一开始有约 100 户到现在留下来的 47 户，但其实你会见到越来越凝聚到想法近似的人，一起面对眼前的难关冲破。村民与村民之间一定会有矛盾存在，但这个矛盾一定 远远少过‘乡’层面有的矛盾。在一个固定的选区界线内，‘乡’已经有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有乡事派、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地产商、露天货仓场营运商等，各者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瓜葛是十分复杂的。我们要面对的其实是走入一个管治（Governance）的问题。”听毕，我脑海立即浮起了从关羽过五关直到刘备入蜀的文学景致，谁能预知某一天，八乡能够转变成粮丰物阜的天府之国？

返回基本距离的社区民主



在地经营不只是一个纵向的时间问题，阿迪提出横向的地理问题更迫切要处理的理由："以往的土地运动，如保留菜园村运动，我们多是吸纳到想法近似的人从市区或远处千里绍绍入来帮手，但反而只一路之隔的另一条村，就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其实邻居正是你最需要连结的人，因为他跟你住在同一个社区，最能明白你的生活状态，最体会到大家共同面对的社区问题。"

"一个从市区长途跋涉入来的义工，说真的，不多不少是对乡郊抱有一些浪漫化的景象才入来帮忙，他未必真正理解何谓乡郊政治。我不是排除以想法近似的人做连结的作用，但一个没有距离感的土地运动是注定失败的。"

返回人与人最基本的距离的提法，可能让键盘战士失望了，然而这实体距离的地理思考并非为针对虚拟群体，倒带着孕育民主的深切关怀。"长远的目标是乡郊不同角落里推动民主，所以要在一个地点开始，让居民学习民主，实践民主。即是一个群体内人人应该得到更多资讯接收，了解社区中的问题，而每个人能学会不只着眼于自己最贴身的利益事宜，对于社区的问题一起关注，要有沟通有讨论，一起讨论出解决方法。菜园村就是一个培养民主群体的例子，而再进一步去要乡的层面就要培养一个更大的民主群体。当然在乡郊层面，眼前还有很多障碍和忌讳，我们要冲破，就要在乡郊各个角落培养民主群体，例如在新田、八乡、南丫岛等， 并扩展其他的村落。"

由于不少地区实践都"做坏手势"，迪不厌其烦地澄清孕育社区民主的目标："但培养民主不是要做透明人，不是当选后就跟着选民随风摆。自己在培养民 主，自己也带着一个想法，在社区中有领导性的想法，有政治目标。但如何坚持本来的信念又不受群众随风摆，是需要学习的，但我认为如果有越来越多地方有培养到民主的群体出现，可以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好或坏的状态作准备。"

"香港将来的民主进程无人知晓，坏的是可能突然间大陆派个市委书记来治港，那更显得有一些培养了民主的群体的重要性，八乡就是不会向这种状态低头 的堡垒；好的是也可能很快有双普选，那当香港人得到期望以久的东西之后，如何令大家更加认真去对待这件事？那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令八乡、新田等地区的群 体到那个阶段时成为一个正面、有民主实力的团体。要找一个据点的想法早在两三年前已经有，因为以往在不同地点组织运动后，不久就被人踢走，之后就散。现在 在一个据点落脚，要这里成为"踢不走的据点"，因为再无人可以拆走菜园新村，那我们起码有一个据点去培养民主。"





第二部份：八乡选战

由零开始倒数

我们始明白迪参选的思想脉络，让我们回到眼前的八乡选战。

八乡有其独特的优势，就是八乡内有超过三十个渔护署指定的有机农庄，地理上又处于新界中部，被三个郊野公园包围，有其发展农业和实践绿色社区的优越条件。

在八乡北的选区就有三位候选人，另外两位是邓姓原居民，一位是现任村代表邓镕耀，另一位是现任八乡北的区议员邓贵有。人家次次有几十人助选团出动压阵，迪却要由零开始，介绍政纲，让人认识自己和土盟，本来应该细水长流的工夫浓缩到两个多月内密集地进行。

整场区选的想法，迪把八乡区大概分了三类社群：原居民、非原居民和由市区搬入来的城市人。“起初我们以为，第二和第三类选民会比较容易接触，所以一直着手在锦上路站摆街站，到近十月时才主力入原居民村宣传。”初时以为这两类是主要拉票的对象，现在发现其实困难重重：“由于第二类的太习惯服膺既有政治架构，对乡事派和原居民也抱有点忌讳的心态；而第三类人多是从市区新搬来的中产，缺乏对地区的感情和归属感，亦同样对乡郊政治抱有冷感。要连结他们，有很多工夫需要从零开始做起。”



数月来，八乡团队制作了近三十份不同议题传单，即平均每三日就发现一个新的地区问题。地毯式的乡郊纵横，将廿多年来因封闭的乡郊政治而隐没的社区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揭开。一位着名的政客曾在参选英国乡郊时说过“Find me one rural problem and I will pay you a hundred pounds”，在既以往成功争取的横额也懒得悬挂的八乡，抑压以久问题却等不住爆发，象征着乡郊政治环境改变的呼声。

为“空壳”规划填充

对于阿迪，在八乡的菜园村被迁拆是一个触发点，但从八乡（包括八乡南、北）的选区中可看到几个在新界乡郊的关键问题：乡郊政治垄断、乡郊宁静与私有产权之间的对立、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瓜葛等，在当区参选正是要藉此突破乡郊政治垄断的局面。这些牢固的利益关系，最具体的呈现正是在八乡的规划图上。

迪的经验告诉我们，八乡的规划比纸还要轻，比平地更无险可守：“在八乡的规划图上你可看到很大片划作所谓的‘农业’地带(“AGR” zone)的地方，但这个地带只是一个空壳，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按他的政治势力或经济势力去利用城规这个制度，把不同的内容（当然不是农业活动，主要豪宅、 餐厅、商店）填进去。”很多人认为有农地荒废是“浪费”，所以改变作不同用途，更能“活化地区”，“善用土地”，很有理据。”但这只是一个被合理化的主流思想，八乡的规划状况需要一些新的行动计划取代之：“我们保育农地，就是要在荒废的农地复耕，蕴酿出另一个可能性的存在。当然这是很漫长的路，而现在做的‘八乡人食八乡菜’和‘绿色生活网络’计划，就是要朝向这个目标进发。”

农业实践网络得到八乡整区重视的一天，八乡的规划才能得到最具体的填充，不断产生的“农地转 x 地”的规划问题及背后的乡郊政治垄断问题，我们便有反击的坚实基础。

绿色八乡　色彩共融

支撑着整个八乡选战的“绿色生活网络”，究竟是一个什么主意？“实行‘绿色生活网络’，就是要建立一个从居民、从生活出发的而非基于既得利益来运作居民组织，在区内突破固有乡事委员会架构的地区网络。我们先有菜园村绿色生活社，然后再有八乡搞绿色生活社，当越来越多有这种绿色理念的人加入后，进而 广之到其他村落及其他地区都有自己的居民组织，长远去构思绿色生活，自主营运绿色社区。”

这种社区的想像不必只停留在购买有机菜的中产社区，迪在参选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新事情，刺激了一些新想法：“例如，八乡内其实有很多不同族裔的人在 此区落地生根，有南亚人、非洲人，另外还有低收入的大陆移民、不准工作的政治难民、伤残人仕、老人家等等，这



些人我们在之前都忽略了，到底应该怎样去帮助 他们也融入八乡社区中？例如为少数族裔社群搞一些活动，促进他们与本地人共融？又或规划出对伤残人仕友善的道路网络？

“这一切都丰富了我们对八乡的愿景，除了绿色生活、复耕农业，还有其他被忽视的群体我们都会在乎，我想土地正义也必须要顾及不同族群的生存权利。”

总结：

两个多月在八乡的蕴酿的确令人刮目相看，主意、宣传、人手及地区网络等基础，八乡团队都已成形了。为了阻止各种破坏绿色生活环境与及突破乡郊封闭政治，八乡的选民还要犹豫什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贾选凝：香港的“在地”价值为何珍贵？


贾选凝，香港媒体人，文化评论作者。

> **本土首先要有“土”。“新界东北”争议归根结底就是要挑战发展的迷思。如果“发展”的前提不是“永续”，反而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毁掉良田，那么这“发展”就充满遗憾，完全没从“人”的角度出发考量。**

一个故事有许多种讲法，一件事也同理。挂心香港事的，对“新界东北发展”争议早有耳闻。不大关心的，或许也看了《窃听风云 3》，约略知道新界的土地发展问题，还记住了“丁权”这词。电影里故事烂尾，其实不怪导演，如果从殖民地年代颁布丁屋政策至今近半个世纪留给新界的土地问题，两小时电影就能摆平，那电影外的“新界东北”也不会让梁特首挠头到搬出金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来呼吁港人合作——不过这种捉错用神的效果，倒是和《窃 3》里几个土豪突兀地唱起 TVB 怀旧主题曲有得一拼。

我会认为，“新界东北发展”争议里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最近激烈到不得了的立法会，不是讨论背后多大比例上在“反深港融合”，甚至也不是地产商的利益输送（香港地产问题的贪念又非新界独有），而是一种近年来在香港逐步凝聚受到重视又难能可贵的本土性：“在地。”

《窃听风云 3》里，站在农地上的周迅反问吴彦祖“你不知道地是用来种不是用来卖的吗？”其实讲得做作，却还是在戏院的黑暗里，微妙刺中了人心。“土地”这个词，距离我们有多远？先不谈香港，内地年轻人怎样看待土地？我很少在一线城市听到 80、90 后去讨论这议题。我们习惯于讨论房产地价租金，但不是土地。

“土地”在单一扁平的城市生活结构里是很飘渺的概念，和大多数人无关。又有多少年轻一辈会对温铁军所说的“如果不了解乡土中国，你连一个做中国人的资格都没有”心有戚戚？整整一代渴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学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拼了命也要考上大学，考



去城市，脱离农村，摆脱自己的“乡土”身份。无数年轻人，透过艰困高考获取高等教育机会，就是为了彻底脱离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

谈土地谈农业有什么功用？我们先来认识一个新界人。他叫袁易天，港大比较文学系毕业，父母都是新界农人，从小有帮家人务农的生活经验。香港回归那年，他放弃城市工作在粉岭找了块农田尝试有机耕种，当起了“农夫”。

同龄人的职业绩效以三年五载去计，可种地是漫漫的一生一世，急不得。十几年来，他把青春都给了新界农田。前两年一场讨论农业和城市发展关系的讲座上，他说：“想呼吸一口清新空气，想见见绿色……这就是农业的功用。”

如今“新界东北”吵得如火如荼，他又站出来告诉人们，“新界东北”计划发展的上水、粉岭、沙头角、打鼓岭这几处主要区域，都是最宜耕宜种的好地，这些土地上能种出兰芥、雷公凿苦瓜、唐芹、白通和西洋菜——最在地的香港的菜。农业有什么功用？这些看得见的本土食材，天然有机，吃进口里，滋养的是本土的生命。

《窃听风云 3》的导演麦兆辉、庄文强在访问中质疑人们何须如此沉迷“发展”？“发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习惯，就像我们习惯认为“香港地少人多，当然更谈不上农业了”。可事实上香港不是没有农业，近年更有趋势许多年轻人主动选择像袁易天那样走进农田耕种，香港只是“一块农地都不能少”，不能用“发展”作为摧毁农田生态的理由。更何况这“发展”还把“私人发展”和公共用途混在一处。单以粉岭北为例，八成地都要拿来建私楼。





【香港 80 后对"本土"的爱】

“反新界东北发展”的呼声里，许多站在最前线的，是香港本土的 80 后。像卓佳佳，一个很年轻的女孩，2007 年才进大学，野外考察机缘巧合爱上了粉岭北的农地，她协同马屎埔村居民一起成立了实践永续农业的“马宝宝社区农场”。

日前，她在公开发言里告诉香港人：“当有了土地和本土农业，我们虽然不能一下子瓦解资本集团，但至少我们会有选择空间，生活上多了一种可能性。”——你会发现，这班香港年轻人所表现出的“反抗”意识，不是泛政治化的。

他们不像他们上一代那样背靠大历史框架去投身社运，他们也没有知识分子那种抽象的价值执迷。这批香港“80 后”是实打实生长在本土，他们的成长环境决定了的他们的主体性没受到太多殖民浸染，也不会被裹挟进大中华的身份认同里。他们爱的，就是伴随他们从小长到大的香港，他们想在这里生活、生产、呼吸、自给，想要这片土地拥抱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这批年轻人的“本土主义”想法是“在地”，是从个人实践出发。信念对他们来说不是高大空洞的价值，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他们没去选择那种一万三万五万拼资历搏加薪的生活模式，他们敢于放弃自己在主流价值所肯定的向上流动的社会阶梯中的位置，和新界村民一起种菜，过一个月用几千块的生活。他们不依赖“发展”的大系统也活得不错，而他们也想把这种“生活”展现给新界之外的更多人。

“马宝宝社区农场”四年里办了 300 多次导赏团，都是卓佳佳自己去带。这个小女生走在烈日暴晒的农地里一次又一次去跟人解释“新界东北”是怎么回事，食物、生活、农业、发展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她想让更多港人明白“土地不属于人，是人类属于土地”，所以当她讲出：“土地资源不是上一代留给我们，而是我们向下一代借用”时，我会觉得比《窃 3》里周迅的煽情反问更有力量也更让人信服得多。因为你看得见她对土地的情感，也看见她在扎实地耕作。

其实在我们讨论香港问题时，不是一谈本土一谈在地，情绪就要对立剑拔弩张。“在地”论述在香港开始得很晚，近年才逐渐形成一股趋势。而这观念本身的正能量，单看韩国就是好例子。

韩国农协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提出“身土不二”口号，出自大乘经的一句佛偈，成了照亮民族主体性的明灯。韩国媒体当时大力引导国民相信，吃自己土地上生长出的农作物才最健康，还透过各种渠道让国人了解本土的农林渔业土特产。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韩国



人信赖国货、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型从农产品一路延伸到科技、制造业、轻工业乃至文化产品，他们对“本土”的信心久而久之成了信仰。

本土首先要有“土”。“新界东北”争议归根结底就是要挑战发展的迷思。如果“发展”的前提不是“永续”，反而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毁掉良田，那么这“发展”就充满遗憾，完全没从“人”的角度出发考量。

对常年生活在都市远离自然和农业的我们来说，“身与土”看起来似乎并不依存，所以城与乡、人与地、昆虫与瓜田间的共生关系也普遍被忽略。的确这些内容，和股票数字和朝九晚五和消费带来的愉悦是没什么关系，但却是我们活着的最基本支撑。



在地，就是对本土的爱。你爱一个地方，才会爱它的农地、乡郊、空气和水，然后才谈得上从中提炼结连文化和生活习惯。地道港人里，又有多少爱这个“我城”并不繁华的部分？了解新界一直有“耕住合一”的生活模式？卓佳佳那班年轻 80 后，恰恰就是想让更多港人知道香港不只有“城市规划”也可以有“城乡规划”——香港有乡有地有田需要保护，不要急着把它们铲平兑换成几十层的居住单位。

【“在地”是一种观念改变】

那我们再来谈“反抗”。在“反抗”这件事里站在最前线的人，就一定具有某种暴力色彩吗？试想一下，一群每天在关心怎么耕田运菜怎么多种树吸引些雀鸟吃害虫的人，能有多暴力？能想去争些什么？他们拥抱的是这个地方，也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些香港的 80 后不

像他们上一代那样把家国挂在口边，但也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非要跟体制对着干。就像卓佳佳说："摧毁新界的过程，是一种由上而下、资本垄断的权力，那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和抵抗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班年轻人的诉求放在"反抗"港府层面，其实是低估了他们。他们为了他们所向往的"在地生活"，付出了世俗意义上的物质生活代价，他们不贪图半吊子的兼顾两全，他们要的就是有机的天然的生活。他们真正反叛和对抗的是更高层面的资本与权力所形构出的意识形态霸权。所以他们是很颠覆，但也很平和，比高喊口号的"左胶"更颠覆，又比唯恐天下不乱的"右胶"更真正懂得"本土"。

颠覆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霸权，其实远比政治口号层次上的对抗冲击更艰难。"在地"的可贵在于这些实践者们身体力行地尝试从"发展"的大系统里脱身，也希望更多人能有醒觉——先不说是否加入他们的行列，至少不去助长这个大系统滚雪球似的吞没一切，连新界的农地也要贪婪吃掉。

当这些本来与世无争活在土地上耕种的人，有朝一日连地都没了，眼睁睁看着一块块良田要变成商场别墅私人物业，他们可以怎么办？他们的"反抗"从一开始就不是街头革命那种行动模式，他们只是没有退路。"发展"的巨大怪兽迫使他们绝地抗争，背水一战对抗资本主义发展观主导的那个最终结构。他们很愤怒，只因那结构太贪婪，迫人屈从同一套"幸福标准"，连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都不给。

"正是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没有疯狂开发新界的乡土，我们才有保护和回眸的空间。"其实读到卓佳佳这句话时，我更感动于他们目光的长远。一件事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角度，我无意在此背书他们抗争的合理性，甚至无意于梳理"丁权"这个殖民年代的后遗症作为香港本地土豪资本的剥削结构，怎样和大资本膨胀后结连政治的垄断结构一起形成双重剥削结构，再借堂而皇之的"发展"价值观，去伤害新界的本土生活方式与美感。我只想回到卓佳佳他们 2010 年建"马宝宝农场"时的那个根本宗旨：永续。

"在地"同样是为了"发展"，重塑有机农地的食物链、重塑城、乡和人的关系是为了"永续发展"——"发展"人对土地的情感和生存依赖，"发展"人顺应天时、不时不植的对自然法则的谦卑，"发展"人们对香港其实也有农业、香港人其实不是自私又短视只图财富的重新认识。

"在地"价值不只是和农民一起呼吸，也是分工改变社会保留原乡的一则新的香港"发展"故事。移风易俗势必透过几代绵延才有效力，但有意识地接续，就有了世代传承的观念。



从前香港的主流趋势和内地一样，没人想留在农村，人们看不起农夫的劳作，意识不到耕种不是“低下技术”而需要动脑钻研不破坏泥土的有机窍门。但香港在我心目中的好，或许就是当它的资本优势发挥到九成之后，还能留有一成力，去培育回归初心回归“在地”的正念。

爱重土地身土不二，人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养分与尊严。而这班 80 后年轻人所坚持的念想，也是香港新“本土性”里滤掉非理性扰攘的最珍贵内容。

（本文来自腾讯大家频道）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推荐阅读】冯城生、袁绍基：内地和香港的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比较

> **香港土地的使用权是以批约/契约形式，以有偿有限期使用的条件批给个人、法人或团体。**

引言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份。然而，国家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按香港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便由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 法(备注 1)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容许香港 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的制度五十年，使原有的制度包括普通法及其相关的法律制度得以继续适用。

回归后的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接触更频繁。不少香港市民在内地经商购屋，和内地的单位或个 人建立种种的法律关系。但因实行"一国两制"， 两地的法律渊源和系统都不同，"法律冲突 "的发生在所难免(备注 2)。解决的办法应从"法律冲突法"入手。但由于历史的关系，本 港法律界人仕对"法律冲突法"的认识不多，面对"法律冲突"的情况，不少本港的注册执业律 师为之惘然，不知如何是好。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本港法律界人仕应急起直追，对"法律冲 突"和"法律冲突法"进行研究。当然, 要解决"冲突"，首先应要了解两地区在法律方面的异 同。这当然需要有心人作出一定的努力才可。

限于篇幅, 本文只就内地与香港这两个法律区域(下简称"法区")在土地使用制度上的异同作 出讨论。在其它方面，希望各界的有心人能作出贡献。

……

根据基本法,在香港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香港特区政府负责管理或安排其使用、开发、出租或批租给个人、法人或团体使用或开发等。(备注 17)

香港土地的使用权是以批约/契约形式，以有偿有限期使用的条件批给个人、法人或团体。除了圣约翰大教堂是无限期批约(freehold grant)外，香港早期的批约年期有 999 年、99



年及 75 年等。后来，香港岛及九龙地区的批约均定为 75 年，这些批约可据《政府地批约条 例》厘定新租金续批。

新界及新九龙的土地批约年期均是从 1898 年 7 月 1 日起计 99 年期少三天，这些批约均已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满期。 而根据中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附件三 第二条，除了短期租约和特殊用途的契约外，已由香港英国政府批出的 1997 年 6 月 30 日以 前期满而没有续期权利的土地契约，如承租人(Lessee)或承批人(Grantee)愿意，均可续期 至 2047 年 6 月 30 日止。续期不用补“地价”，有关的承租人只需从续期之日起，每年缴纳相 当于当日该土地应课差饷租值百分之三的土地租金。此后，随应课差饷租值的改变而调整土地租金。 至于旧批约地段，乡村屋地，丁屋地和类似的农村土地，如该土地在 1984 年 6 月 30 日的承租人或在该日以后批出的丁屋地的承租人，其父系为 1898 年在香港的原有乡村居 民，只要该土地的承租人仍为该人或其合法父系继承人，土地租金将维持不变。这样的特殊 安排，是为了尊重历史。原来，英国政府和当时的满清政府在 1898 年签署的第二次《北京条约》中有条款订明新界原居民地主的永久地权应予保留。虽然，英国政府对此条款无法完 全执行(备注 18)，但对新界原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则一直予以尊重。故在中英联合声明中， 对新界原居民在新界土地上的某种权益给予特别的安排。

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区成立以前已批出、决定或续期的超越 1997 年 6 月 30 日年期的所有土 地契约和与土地契约有关的一切权利，均按照香港的法律继续予以承认和保护(备注 19)。

全文阅读请点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应】

周回，刺青杂志记者。

周回：“土地不属于人，人属于土地”——卓佳佳专访

> **土地不屬於人，人類才是屬於土地的。人類忘了土地是我們賴以維生所需的資源，一旦將其破壞，就不可逆轉。土地有著很多可能性，但經歷城市化後，就變得單一。**



从小到大，教科书都告诉我们，香港由渔港过渡至工业城市，再变成金融枢纽。传说女娲用泥土创造人类，然而现今社会，发展就是先进的象征，农业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落后的代名词，“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再不复见。新界东北发展议题闹得满城风雨，发展与保育彷佛处于极端的对立面。然而，城市和乡郊，是否必定不能共存，必须二择其一？刺青杂志请来粉岭北农村及居民联席、马宝宝社区农场成员卓佳佳一谈对土地和发展的看法。



城乡共生，互相依存

在守护新界东北的集会上，其中一句常常听到的口号是“城乡共生”。人类以万物之灵自居，认为人是至高无尚的，可随意拍死蚂蚁、青蛙等小动物。但卓佳佳拒绝那种“人是人，农村是农村”的二分说法。“农夫是和事佬，调和城市与乡郊的关系。生态衰弱对我们没有好处，城与乡、人与地、虫与瓜，统统都是都是互相依存的。”把城市和乡郊立于矛盾点的人，目的是把乡郊掠夺成城市范围。然而，城市和乡郊是互相需要对方的。“城市人”需要到乡郊舒展身心，看看萤火虫，听听风声；而农夫则需要城市的厨余作堆肥，也需要市场去输出农产品，两者互惠互利，互相依存，这就是城乡共生。

“土地不属于人，人类才是属于土地的。人类忘了土地是我们赖以维生所需的资源，一旦将其破坏，就不可逆转。土地有着很多可能性，但经历城市化后，就变得单一。”土地不是死气沉沉的，我们可以在土地耕种、用泥土烧陶瓷作器皿。土地亦是许多生命，如昆虫、微生物的安乐窝。但盲目发展，却把充满生命力的土地私有化，商品化。“我们现在还能守护新界东北，是因为上一代没有将其开发；但我们这一代不停疯狂发展、填海，日后还有甚么给下一代去守护？土地资源不是上一代留给我们，而是我们向下一代借用的。如果人有这个概念，就不会如此盲目地开发。”她提醒，在这个处处有食物安全危机的时代，我们更要好好思考本土农业的发展。

爱上东北，犹如爱上癌症病人

卓佳佳在新界东北住过约一年，说起当时的生活，她不期然笑得灿烂。“农村的环境不会永远一样，有时觉得连扫地都是期间限定的，因为下一次再扫时，所扫的树叶已经不同了。例如每年五月凤凰木会开花，到处都是红彤彤的；三月份满地是台湾相思；五月也有很多棉絮滚来滚去。你会很留意这些变化，是因为你觉得这地方日后不会再存在了。”住在农村，她每朝每晚也听到雀鸟的叫声，在家中，会有青蛙走进浴室，家里的客厅永远有一只很大的蜘蛛，赶也不走，只好替它取名字和一起生活。出了家门，就是蓝天白云绿草地，看见通菜婆在收割，转个弯，又看见婆婆丢完垃圾在拉筋。听着佳佳的话，真正的天人合一彷佛呈现眼前。然而提及东北发展，她不禁转喜为忧。“由我第一日踏入马屎埔，就好像和一个末期癌症病人相恋。”

佳佳坦言，“新界东北”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很陌生的词汇，很多人甚至对新界也没甚么概念。过去数十年，每个人都迷信发展，没想过要反对。发展主义的迷思深深地植根在大家脑海，佳佳认为我们要思考一下，发展新市镇以外的可能性。“马宝宝的成立，正正告诉



大家香港是可以发展本土农业的。新界东北里面有很多农业，古洞也有很多轻工业，新界东北其实是如此充满生命力的世界。”

地产商的精神暴力

一小时的访问中，佳佳提及得最多次数的关键词，是“地产商”。而她要离开家人和爱猫，由将军澳搬到东北去居住，也是因为地产商。由九六年起，村里就不时有村民收到律师信，得知自己被逼迁，执达吏又不断说要赶村民离开，或是地政总署人员指村民的地是官地，要收回。一切一切，都源于“发展”。“发展就如硬币的两面，在发展的同时，一定会有人牺牲。城市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累积资本的过程，当城市不断发展，正正映照着其他地方的不发展。所以反对发展东北，同时是反对这种发展主义。”

地产商的盲目开发，不仅摧毁着大自然，也能摧毁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一个老婆婆，在五十年代时和现已去世的丈夫来到新界定居。她家门前有一道石屎径，细看之下，径上有着粗幼度不一的裂缝。原来当年夫妇二人用卖菜得来的钱买英泥，每卖一次买一次，逐少逐少把泥路堆好。“他们用了数十年的时间，逐少把土地建立起来。老人家年轻时赚的钱，都投放在他们的家园上了，这些都是带不走的。但恒基整天欺负他们，要他们搬走。”佳佳说这只是冰山一角，恒基地产每天在村民家附近钻探，钻探的声音是一种心理上的滋扰，好像在每天告诉村民，我要来拆你的家，请你快点搬走。结果不少村民被精神折磨，见到铁丝网就变得紧张，也有村民因此不外出，甚至不敢开电视。“地产商用铁丝网围着村落，村民就好像坐牢般，这就是精神暴力。”

前路未明，她始终面带笑容

由九六年起抗争至今，新界东北、一众村民，以至全体香港人的农业发展也去向未明。访问当天，眼看还有不足一星期，新界东北发展拨款就要在立法会强行通过了。但卓佳佳几乎在整个访问中，仍然挂着笑容，态度乐观。虽然很多人说香港正步向死亡，政府越来越不听民意，但由 09 年反高铁，到今天 14 年反东北发展，佳佳看到公民社会越来越多人醒觉，为自己的城市努力。很多人不再只靠政治明星或代议政制，而是分工改变社会。无论东北计划结果如何，至少香港人也有了“永续发展”，“城乡共生”，这些以往只在口号出现，却很少实践的概念。她希望日后导赏团介绍的，不是地产商如何欺负居民，而是居民如何重建家园，呈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本文来自《刺青杂志》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西雅图：你们怎么可以买卖天空和土地



西雅图，印第安索瓜米西族酋长

“

我们知道大地不属于人，人属于大地。这是我们确知的。万物都是相关联的，像血缘连结家庭一样。万物都是相连的。任何发生在大地上的事也会发生在大地的孩子身上。生命之网并不是人织出来的，人只是网里的一条线。

”

你怎能买卖天空和土地？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太奇怪了。如果我们不能拥有空气的清新和水的晶莹，你又怎麼能买到这些？对我们的民族来说，大地的每一部份都是神圣的。每一根松针、每一个沙岸、夜晚树林裡的每一滴露水、每一隻嗡嗡响的昆虫，对我们的民族在记忆与经验中都是神圣的。树木裡流动的汁液都夹带着红人（印地安人）的记忆。

白人死了以后就忘了他们出生的地方，魂魄走到天上的星星之间。我们的族人死了以后从不忘记这个美丽的大地，因为大地是红人的母亲。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姊妹，鹿、马和秃鹰是我们的兄弟。山峰、草的汁液、小马的体温，还有人都是同一个家庭。

所以当在华盛顿的大统领送来信息说他想要买我们的土地，他是对我们要的太多了。这个白人的大统领传来信息说他会保留一块土地给我们过舒服的生活，他会像父亲一样的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会考虑你们买土地的提议，但是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因为这块地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河川裡闪亮的流水并不只是水，而是我们祖先的血。

如果我们把地卖给你们，你们必须记得这块地是神圣的，而且你们必须教导你们的孩子们那是神圣的，而且河裡的每一个闪光都是在诉说我们民族生命中的某一件事。潺潺的水声是我们祖先的声音。



我们兄弟的河流解了我们的渴，河流载送我们的独木舟而且喂养了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把地卖给你们，你们要记得教你们的孩子说河流是我们的兄弟，而你们也必须像对待我们的兄弟一样善待河流。

我们知道白人不瞭解我们的方式。每一块地对他（白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对他而言，他只是一个陌生人，从土地拿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土地不是他的兄弟，而是敌人。当他征服了这个敌人，他就继续去征服下一个。他把他父亲的坟墓丢在后面，而且不在乎。他把大地从他的孩子手上绑架去了，而且他不在乎。他父亲的坟墓和他的孩子出生的权力都被遗忘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方式和你们不同。你们都市的景象让我们红人看了刺眼。但也许因为红人是野蛮人而且不瞭解你们。在白人的城市裡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地方可以听春天树叶飘动的声音、或是昆虫翅膀拍动的声音。但也许是因为我是野蛮人而且不瞭解你们。嘈杂的声音只会伤害耳朵。而且如果一个人不能听到夜鹰孤单的叫声，或夜晚青蛙在池畔的辩论，那麽生活中还有什麽意思呢？我是一个红人而且不瞭解你们。印地安人喜欢夜晚柔软的风声疾飞过河面，也喜欢风本身的味道，在日间的雨裡清洗过后的风的原味，或是溷杂了松树的香味。

空气对红人是珍贵的，因为万物都分享同样的呼吸，野兽、树木、人都分享同样的呼吸。白人似乎没注意到他呼吸的空气。像是已经死去数日的人，他对恶臭已经麻木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地卖给你，你必须要记住空气对我们是珍贵的，空气和依靠空气生存的万物分享一样的精神。

带给我们祖父第一次呼吸的风也带给他最后一口气。但如果我们把地卖给你，你必须要把它和其他的地分开而且让它保持神圣，让这个地方连白人都可以去品嚐风经过草地上的花后的甜美味道。所以我们会考虑你买地的提议。

如果我们决定接受，我会有一个条件—白人要像对待兄弟一样的对待这块土地上的野兽。我是一个野蛮人而且我不瞭解任何其它的方式。我曾经看过草原上有成千的野牛腐尸，都是被白人从火车上射杀的。我是一个野蛮人而且我不瞭解为什麽冒烟的铁马会比我们在必须要赖以维生才会杀的野牛还重要。人如果没有这些野兽怎麽办？如果野兽都没了，人就会因为精神的寂寞而死。发生在野兽身上的任何事也会很快就发生在人身上。万物都是相关的。

你必须教导你的孩子们他们脚下的土地是我们祖先的灰烬。所以他们会尊敬这块土地，告诉他们大地富含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告诉你们的孩子我们已经教导我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



的母亲。任何发生在大地上的事也会发生在大地的孩子身上。如果人对地上吐口水，他们就是对自己吐口水。

我们知道大地不属于人，人属于大地。这是我们确知的。万物都是相关联的，像血缘连结家庭一样。万物都是相连的。任何发生在大地上的事也会发生在大地的孩子身上。生命之网并不是人织出来的，人只是网裡的一条线。他对生命之网所做的任何事都会回到他自己身上。即使是白人，虽然他们的上帝跟他们像朋友一样一起行走交谈，他们还是不能免除共同的命运。我们终究都是兄弟。我们会看到。我们确信白人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神和他们的神是同一个。

你们现在可能认为你们拥有神，就像你们想拥有我们的土地一样，但是你们是做不到的。神是所有人的神，而神对红人和白人的爱是平等的。大地对神是珍贵的，伤害大地就是冒犯神。白人也会消失，也许会比任何其它族都快。污染你自己的床，你就终将有一晚会窒息在你自己的垃圾裡。但是在你死时你会光芒闪亮，由上帝的力量引燃光芒，也是这个力量把你带到这片土地，而且因为某种原因赋予你统治这块土地和红人的权力。这样的命运对我们是个谜，因为我们不瞭解野牛为何被屠杀、野马被驯服、森林的神圣角落充满人的气味、山丘上的景致被通话的缆线玷污。

灌木林到哪裡去了？消失了。

秃鹰到哪裡去了？消失了。

生活结束了，挣扎开始了。

本文来自译言网，译者：将心照明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沙乡年鉴》



作者：（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译者：侯文蕙

出版年：1997-1

页数：256

定价：13.50 元

装帧：简装本

丛书：绿色经典文库





ISBN: 9787206028120

《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是《沙乡年鉴》一书的最后一章。他在序言中说：“土地是一个共同体的观念，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但是，土地应该被热爱和尊敬，却是一种伦理观念的延伸。土地产生了文化结果，这是长期以来人所周知的事实，但却总是被人所忘却。”“土地伦理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大地伦理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地从技术化了的现代人的控制下求得生存。因为只有当我们把大地看做是一个我们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才会带着热爱和尊重来使用它。然最着名及最具原创性的大地伦理的思想，莫过于利奥波德提出了一个生态伦理学的原则：“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与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综结而言，大地伦理所揭示的的环境伦理思想有三：

1、人的道德规范要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係，扩展到调节人与自然（大地）的关係。大地伦理扩大了共同体的界限，凸显了一种整体论的观点，它包括了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亦即：大地。

2、人类必须重新考虑自己作为自然界成员和公民的角色。

3、大地伦理主张确立新的伦理价值尺度，认为只从经济学的尺度对自然进行评价是不够的。

原文摘选：

“完全以经济目的作为基础的自然保护系统有一个基本弱点，那就是土地群集的成员大半没有经济价值。”

“土地伦理规范，或是能将更多的责任交托给私有土地拥有者的其他力量。”

“让私有土地拥有者负起土地伦理责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变】

【推荐阅读】费冲之：私有财产制下的土地正义

费冲之，立报奔报撰稿人

"

土地征收的问题，除了补偿的价格问题外，应该是人与土地的分离。民众一旦失去赖以维生、赖以居住的土地、建筑，在台湾当前地价、房价与劳动条件下，几乎就等同于破产，因此一次性土地买断的作法，恐怕已经不能回应当下民众对失去土地的恐慌。

"

周折且骇人听闻的征地血泪

苗栗县大埔征收案被拆迁住户，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控告内政部区段征收违法，经更一审宣判，共有彭秀春等 4 户胜诉，撤销了原先对这 4 户人家土地和建物的区段征收。胜诉的 4 户大埔居民，在历经两年家破人亡的种种打击后，终于换来一丝迟到且微弱的正义。

大埔的故事必需要回溯到 2008 年。当时群创光电向县府申请增加竹科竹南基地 4.98 公顷的用地，于是苗栗县政府便将邻近的大埔里民宅、农地划入竹科竹南基地区段征收范围内。就在 2010 年的夏天，怪手闯进了县府号称完成征收程序的农田，肆意地将农田与稻谷毁坏。征收区内一位朱老奶奶，因无法承受失去家园与将来生活无以为继的心理压力，选择以喝农药结束生命。一连串的事件，引发了反对该地方征收“一方有难、八方来援”的社会运动。

时任行政院院长、现任副总统吴敦义迫于民意，曾同意停止拆除大埔居民的房屋，承诺“原屋保留”、“区段范围内集中划设农地”。然而 2012 年内政部都委会会议中，却又以“影响道路”为由，决议拆除前述 4 户人家的 3 户房舍、1 户土地。2013 年夏天，县府又趁着拆迁户及声援者北上陈情之际，见“天赐良机”（县长刘政鸿语），在警力掩护下迅



速地将这 4 户拆除。其中一拆迁户“张药房”主人张森文，更于拆除后 2 个月离奇地落水身亡。在历时 3 年的抗争中，支持者曾对行政院长上至总统等人在各地的行程进行突击性抗议，甚至在台北凯道抗议后转而包围内政部。

……

不只是一部法令的问题

台湾的土地制度是奠基于私有财产制度，换言之，除了部分私有土地（如农地）受到买卖管制外，无论任何涉及空间需求的活动，都必需经由市场手段。长期以来土地价格便存有“公告土地现值”、“市价”双轨行情。前一波对土地征收条例修法已将征收改为依市价征收，已意味政府以丧失低价征收的手段，对兴辟公共建设的土地征收成本将回馈到现有财政支出当中。即便是在财务规划上以开发后的收益作为平衡，也将堆高后续开发成本，势必将转嫁成为房价。对于土地征收制度，如果仅止于第一次重分配过程的公平性，恐怕无法真正落实土地正义。

土地征收的问题，除了补偿的价格问题外，应该是人与土地的分离。民众一旦失去赖以维生、赖以居住的土地、建筑，在台湾当前地价、房价与劳动条件下，几乎就等同于破产，因此一次性土地买断的作法，恐怕已经不能回应当下民众对失去土地的恐慌。再者土地再经政府处分后，往往形成建商推案炒作的标的，这一夕倍翻的获益，又为财团所独占。一来一往间形成巨大的贫富落差，这岂又是所谓制度当中期盼落实的公共利益？正因政府始终没有具体回应征地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又仅是藉由制度规定便宜行事，也因此废止区段征收的论点日益高涨，几乎已是公权力可信度的危机。

区段征收并非全然不可行，只是在制度设计上仍可调整具有收益性的土地储备机制，如征收后纳入土地银行，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将后续转卖私人开发的收益，提供拨付予被征地居民；或是以地易地、以房易房方式，使被征地居民的生计不受影响，这些都是在征收制度中应被纳入的部分。再者，对于土地持有与交易之赋税手段，才是利害之所在，随着市价征收，公告现值也应回归市场交易行情，让真实的交易所得浮现，才能进一步按所得、持有价格征税。也因此，土地征收制度应当被调整，但不是全盘消减政府的行政工具与能量，相对的是如何让政府保有对土地调度的能力，同时也维系民众对土地的基本需求，这才是制订法令所需要思考的。否则，全盘以市场机制作为制度设计，对于稀缺性的土地资源，恐怕将是沦为资本竞逐的对象、恐怕农田将消逝的更快、小土地的持有者将更快沦为一无所有的人，而届时国家公共建设的推动，恐怕只有看财团脸色的份了。

全文阅读请点击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徐世荣：民众参与 落实土地正义


徐世荣，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教授

> “
> **所谓的土地正义，是要将当地民众的主观地方认同放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让他们获得充分的资讯，并且拥有充分的参与机会，然后在多元及冲突的论述当中，决定土地使用的未来方向。**
> ”

随着上周台南东山永扬垃圾场环评桉的撤销，及苗栗后龙湾宝之工业区土地变更桉的驳回，部分农民长达十多年的辛酸及苦楚，终于获得了些微的抒解。但这些仅是极少数幸运的个桉，台湾现今仍然有许多的桉例依旧是让农民惶惶不可终日，土地正义还是无法获得伸张，这也使得土地政策仍然仅是经济政策的附庸及附属品。

何谓土地正义？着名的人文地理学者 John Agnew 认为土地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的空间意义，分别为：一、总体经济环境下的区位空间；二、环境及自然空间；及三、主观的地方认同空间。过去，在经济成长、效率优先及威权政治体制底下，土地政策之决定往往仅是侷限于第一点，土地仅被视之为经济生产要素。近年来，在环境生态保育观点逐渐受到重视之际，第二点偶而会超越了其他不同的观点，不过机率却也不多。然而，至今为止，我们却仍然非常缺乏将第三点纳入于土地政策的考量之中，这使得土地正义一直无法在台湾社会获得体现。

所谓的土地正义，即是指土地政策的决定必须要纳入上述第三点，并且是要将当地民众的主观地方认同放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让他们获得充分的资讯，并且拥有充分的参与机会，然后在多元及冲突的论述当中，决定土地使用的未来方向。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土地隐藏了巨大的财富，许多拥有政治权力的不肖人士，欲由土地中获取暴利，因此，上述的土地多元论点往往是在权力的不当运作之下，使得某种观点特别受到重视，而另外的观点则是被压抑或是排除在外。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台湾的政经发展，政治学者明白指出，台湾的政经结构是愈来愈走向一个由行政官僚、地方派系与资本利益集团所形成的“新的保守联盟”。另有学者将此联盟称之为“新政商关系”或是“新重商主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僚为了追求少数



人的经济利益，不惜成为地方派系与资本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土地使用计画的变更及私有土地的强制徵收就成为彼等获利的最主要工具之一。

规划理论的典范其实早已由“现代化”递移至“后现代化”。以往的主导者以经济成长为主的理性规划模式已受到相当多的质疑，因为长久以来偏限于经济理性的观点已经变成了一种支配霸权，它将许多其他重要的想法（如地方认同、空间归属、道德、公义、美学等）皆排除在外，错误的认为彼等不值得人们的眷恋，唯有立基于经济理性之下的行动才算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如此一来，在这种追求经济成长的理念之下，资本的重要性往往凌驾于对于人类及环境的关怀，规划理论的重心反而是以促进经济成长及竞争力为主要的考量，土地正义的重要性也因此被严重忽略了。如今，建基于对于现代化理念追求的规划理论已被扬弃，人们不再相信经济成长是唯一的判准。在后现代化的年代，必须是以合作式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理念为主，让地方民众能够充分参与规划的过程，并共同来型塑他们生活的空间及公共利益。

土地政策应该要有自己运作及治理的逻辑，它不应再是经济政策的附庸，它也不应再是权力拥有者用来剥削权力弱势者的工具。倘以新竹县为例，不论是“台湾知识旗舰园区（璞玉计画）”或是二重埔及芎林乡区段徵收桉，皆必须透过资讯的提供及理性的充分沟通，让民众及权力弱势的一方皆能够拥有公平参与的权力，共同来决定土地的政策，如此一来，才能够真正体现土地正义的意涵。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与货币>



卡尔·波兰尼，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

> **将市场机制扩展到这些工业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乃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引入工厂制度这一举措不可避免的后果。**

选自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浙江人民，第六章<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页 59-66

第六章 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与货币

我们对经济体系和市场发展脉络分别进行的简单勾勒已经表明，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并且无论经济活动中主导性的行为原则是甚么，我们发现市场模式都能与这种原则相容。我们不曾发现，市场模式所体现的交易或交换原则有压制其他原则而独自扩张的倾向。在市场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即在重商主义的情况下，它们也是兴盛于集权的中央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这种中央管理者的专断范围是如此广泛，从农民的家计到国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只有在这些事实的烛照下，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构成市场经济之基础的、非同寻常的假定。

市场经济是一种仅仅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委托给了这个自发调节的机制。这种类型的经济源自这样一种预期：人类以获取最大的货币所得为目标而行动。它假定：在特定的价格下，市场中可得的货物(或劳务)与在该价格下的需求相等。它还假定货币的存在，并在其持有者手中作为购买力而发挥作用。由此，生产将被价格所控制，因为指导生产的那些人所能获得的利润依赖于价格；货物的分配也依赖于价格，因为价格形成收入，而只有在这些收入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货物才得以在社会成员间分配。在所有这些假定都被满足的情况下，货物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就能单独由价格而获得保证。



自发调节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以在市场上出售作为目的，而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这种出售。相应地，就存在着关于所有工业生产要素的市场，不仅有关于货物(总是包括劳务)的，同样有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它们的价格分别被称为物价、工资、地租和利息。这些术语本身就表明收入来源于价格：利息是使用货币的价格，它形成了那些贷款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使用土地的价格，它形成了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资是使用劳动力的价格，它形成了劳动力出卖者的收入；最后，物价成为那些提供了企业服务的人的收入所得，被称作利润的收入实际上是两组价格的差额，即生产出来的货物价格与其成本——即生产它们所必需的货物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所有的收入都将源自市场上的出售，而收入也将完全能够购买生产出来的所有货物。

由此产生与国家及其政策有关的进一步假设。对市场的形成构成阻碍的任何事物都必须被严格禁止，也不能允许收入通过市场销售之外的任何其他渠道获得。任何通过调整价格来改变市场状况的干涉行为都必须被禁止，不管这里的价格是关于货物、劳动力、土地，还是货币。由此，不仅必须存在关于所有工业生产要素的市场[1]。而且将会影响这些市场运作的任何措施或政策都必须被否定。不管是价格、供给，还是需求，都不能被固定或管制。只有这样一些政策和措施才是适宜的：通过创造有助于市场成为经济领域唯一的组织力量的各种条件，保证市场的自发调节。

为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意味着甚么，让我们暂时回到重商主义以及全国性市场迅速发展起来的那段时期。在封建主义和行会制度下，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为社会组织本身(那时货币尚未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元素)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封建秩序的轴心要素，乃是军事、司法、行政和政治体系的基石；其地位与功能由法律和习俗规范所决定。土地所有权能否转让；如果能，转让的对象是谁、要受到甚么限制；其中包含甚么样的财产权利；某些类型的土地可以作甚么用途——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移出买卖的组织之外，并被置于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制度控制之下。

劳动力的组织情况也是一样。在行会制度下，与从前所有经济体系中的情况一样，生产活动的动机和环境是嵌入社会的一般组织之中的。师傅、熟练工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同业关系，学徒的数量，以及工人的工资等所有这些都是由行会和城镇的规章和习俗规定的。重商主义做的不过是将这些规定统一起来，统一的方式或者是像英国那样通过颁布法规来实现，或者是像法国那样通过将行会“国家化”来实现。至于土地，只有在与地方特权发生关系时，其封建状态才被彻底废除；在其他情况下，土地仍旧是不准买卖的(extra commercium)，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情况都是如此。直到 1789 年大革命之时，地产仍旧是法国社会特权的来源，甚至在那之后的英国，关于土地的普通法本质上还是中世纪性



质的。重商主义，尽管以尽其所能地推进商业化着称，却从未试图将生产的两种基本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变成商业活动的客体，也从未攻击过相关的保护措施。在英国，通过《工匠法》(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1563)和《济贫法》(the Poor Law)(1961)实现的劳工立法“国家化”使劳工脱离了危险境地，而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圈地政策则是反对将土地财产作为获利之用的持久努力。

重商主义，无论如何高调地坚持把商业化作为一项国策，却以与市场经济截然相反的方式理解市场。重商主义的这一面最集中地体现于它在工业中极大地扩展国家干预的这一举措中。在这一点上，重商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戴着王冠的计划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中央集权的官僚与保守的排他主义者之间并无区别。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管制的手段：行会、城镇和地方省份求助于习俗和传统的力量，而新兴的国家权威则偏爱法律和训令。但他们都同样反对将劳动力和土地商业化——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行业工会和封建特权在法国直到 1790 年才被废除；在英国，《工匠法》直到 1813-1814 年才被取消，而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创立的《济贫法》的取消要等到 1834 年。无论两国中的哪一个，在 18 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前，还未曾有人提及建立一个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议题；而经济生活的自发调节的观念更是完全超出了那个时代的视野。重商主义者关心的是发展国家的资源，包括通过贸易和商业实现的充分就业；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组织方式在他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这方面远离现代观念的程度并不亚于其在政治领域——他们没有任何民主倾向，而是信仰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开明君主的统治——远离现代的程度。就像朝着民主体制和代议政治的转变是对时代潮流的彻底逆转一样，18 世纪末从被规制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

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必须把社会制度性地分离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实际上，这样一种二分法不过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重申了一个自发调节市场的存在。也许有人会提出，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任何社会。然而，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论断。的确，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在缺少某种程度保证货物生产和分配秩序的体制的情况下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存在与社会其他部分相分离的经济制度；通常而言，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前者寓于后者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管是在部族的、封建的还是重商主义的条件下，社会中都不存在一个分离的经济体系。19 世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活动被孤立出来并归于一种独特的动机——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点(singular departure)。

除非社会以某种方式屈从于它的要求，否则这样一个制度模式就不可能运转。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中。我们是通过对市场模式的一般分析达到这个结论的，而现在我们可

以给出这个论断的具体论证了。市场经济必须囊括工业生产所需的所有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市场经济中，货币也是工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货币之纳入市场经济将会产生影响深远的制度后果。) 但劳动力和土地只不过是构成社会的人类本身和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将它们囊括进市场机制就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

我们现在可以以更具体的方式分析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对社会构成的威胁。首先我们将描述市场机制用以控制和指导工业生活实际要素的手段；接下来，我们将努力把握这样一种机制对社会——此时社会已经屈从于这种机制的掌控之下——产生的影响的性质。

只有借助商品(commodity)的概念，市场机制才得以适合(geared to)工业生活的诸多要素。在这里，商品被经验性地界定为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出来的物品；而市场则同样被经验性地定义为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实际接触。相应地，工业的每一种要素都被认为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成为与价格相互影响的供求机制的操控对象。从实践来讲，这意味着必须存在关于每一种工业要素的市场；在这些市场中，这些要素的每一种都被组织成一个供给组和一个需求组；每一种要素都有一个与供求状况相互影响的价格。这些市场——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相互勾连，形成一个总市场(One Big Market)[2]。

关键就在于：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同样必须被组织在市场之中；实际上，这些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但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显然都不是商品；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即任何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都必须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对它们而言显然是不成立的。换言之，根据商品的经验定义，它们不是商品。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者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然而，正是在这种虚构的帮助下，关于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实际市场才得以组织起来[3]；它们实实在在地在市场被购买和出售；对它们的需求和供应都数量巨大；而且任何阻碍这些市场形成的政策或措施都不可避免地会危及整个市场体系的自发调节。所以，虚构商品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命运攸关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以最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了社会的几乎所有制度：该原则即是，任何可能妨碍市场机制沿着虚构商品的路线而运转的安排或行为都必须被禁止。



可是，当关涉到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时，这样一个基本假定无法得以维持。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因为“劳动力”(labor power)这种所谓的商品不能被推来拉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饿所造成的社会混乱(dislocation)。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最后，对购买力的市场控制将周期性地肃清扼杀商业企业，因为对后者而言，货币供给的涨落不定会产生如同洪水与干旱之于原始社会的巨大灾难。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市场对市场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一种粗陋虚构(crude fictions)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哪怕只是片刻之间。除非人类的和自然的实体以及商业组织都能得到保护，能够与这个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相对抗。

市场经济的极端人为性(artificiality)根植于以下事实，即在这里生产过程本身乃是通过买和卖的形式来组织的。在一个商业社会中，为市场而组织生产的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不可行的[4]。中世纪晚期，为出口而进行的工业生产是由富有的市民来组织的，并且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城镇，在他们的直接监控下完成的。后来，在重商主义社会，生产由商人来组织并且不再局限于城镇之中；这是一个“外判”(putting out)的时期，家庭手工业通过商业资本家提供的原材料进行生产，这些资本家以纯粹商业企业的方式控制生产过程。只有到那个时候，工业生产才明确地并大规模地处在商人的组织领导之下。商人熟悉市场，了解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并且能够保证原材料供给——顺便提及，这种供给只包括羊毛、染料，以及有时要加上的织机和梳毛机等家庭手工业所需使用的器具。如果原材料的供给不济，受到打击最为严重的是那些家庭手工业从业者，他们会暂时失业；但整个过程并不涉及成本高昂的工厂，因而商人也不会因承担生产责任而招致严峻的风险。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体系的力量和规模都在逐渐成长，最终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毛纺织业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并覆盖了国土的广泛地区，并且生产都是由布商们来组织。以买卖为生的布商，只是顺带促进了生产——他对生产的促进并不需要另外的动机。在这里，商品的制造既不涉及互惠互助的态度，也不存在家庭作坊对需求满足的关切；既没有手艺人由其劳动创造而生的自豪感，更与公共赞誉所带来的满足感无关。所需要的仅仅是



赤裸裸的获利动机，这种动机是以买卖为职业者最熟悉不过的。直到 18 世纪末期，西欧的工业生产仍不过是商业的一个副产品。

只要机器还只是一种既不昂贵也不特殊的工具，这一状况就不会改变。能够在同样时间内大大增加产量这一点，足以诱使家庭手工业从业者采用机器，以便增加收入，但这一事实本身却并不一定影响到生产组织。廉价机器是归工人所有还是归商人所有，显然会对双方地位形成一定影响，并几乎必然会造成工人收入上的差异：只是他自己拥有工具，生活就会好过一点；但这并不会促使商人成为一个工业资本家，或者逼使他不得不借钱给工人购买机器。货物的销路极少会成为问题；困难一直在于原材料的供应，这种供应布时不可避免地会被打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机器的商人遭受的损失也不是实质性的。完全改变了商人与生产之间关系的，并不是像上述那样的机器的到来，而是复杂精制的并因而是专门化的机器和工厂的发明。尽管新的生产组织是商人引入的——这是一个决定了整个转型进程的事实——然而，复杂机器和工厂的使用，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却导致商业和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转变。工业生产不再是商人通过买卖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活动的附属品；现在它包含了长期投资以及相应的风险。除非生产的连续性得到合理的保证，否则，这样一种风险是难以承受的。

然而，工业生产变得越复杂，要求保证供给的工业生产要素也就越多。当然，其中的三种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于是，它们必须被组织起来在市场上出售——换言之，它们必须成为商品。将市场机制扩展到这些工业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乃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引入工厂制度这一举措不可避免的后果。工业生产的要素必须处在待售状态。

这与需要建立一个市场体系这种说法是同义的。我们知道，只有通过相互依赖的竞争性市场所保证的自发调节，利润才有保证。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已经作为买卖过程的一部分而被组织起来，所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必须被转变为商品，以便保证生产的持续。当然，它们并不能真正被转变成商品，因为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被制造出来的。但针对它们的这种为市场而生产的虚构却成了社会的组织原则。在这三者中，有一个尤为突出：劳动力。作为一个技术性术语，劳动力是指人类本身，只要他不是雇用者而是被雇者；由此，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对劳动力的组织将会随着市场体系的组织变化而变。然而，由于劳动力的组织不过是普通大众生活形式的另一种说法，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发展必将伴随着社会组织本身的变化。再往下推，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

我们曾拿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破坏来比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我们说过，一般而言，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进程中被瓦解。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把英国从西班牙式的命运中挽救了出来，方式是通过控制变迁的进程，并将其影响导向相对无害的方向，从而使变迁变得可以承受。但是没有人能把英国的大众从工业革命的冲击中解救出来。对自发性进步(spontaneous progress)的盲目信仰牢牢控制了人们的头脑，甚至当时最具启蒙意识的人也像宗教信徒一样狂热，一味追求无限止、无约束的社会变迁。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冲击。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

由此，19 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而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显然，世界商品市场、世界资本市场以及世界货币市场在金本位制的庇护下为市场机制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动力；但是，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经形成，它致力于抵抗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

[1] Henderson, H. D. Supply and Demand. 1922. 市场的功能是双重的：要素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以及对影响要素总供给的各种力量的组织。

[2] Hawtrey, G. R., op. cit. 在霍特里看来，这个总市场的作用在于使得“所有商品的相关市场价值保持一致”。

[3]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的拜物教特征的论断所指涉的是真相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本文所谈的虚拟商品并无关联。

[4] Cunningham, W.,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

第二十一章： http://cycloaddition.blogspot.com/2011/12/blog-post_7139.html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本期编辑

主编：王菡

编辑：胡馨以

设计：潘雯怡，季文仪

校订：施钰涵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订阅 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订阅 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